

蒙元货币统一与世界经济的诞生*^①

周子衡

〔摘要〕本文从货币经济的角度考察了公元10世纪以降两宋金元朝的货币历史关系,分析了铜币衰败和纸币统一的货币历史进程,揭示了白银替代铜钱成为计价货币的货币转轨,成为中国货币历史上的第二次货币统一。本文进一步分析指出,蒙元货币统一使东亚经济白银化,乃至亚欧大陆的白银经济初具世界意义,至此,白银的货币需求成就其世界性流动,加之美洲白银的汇入,更使世界经济从亚欧大陆拓展为全球经济。

关键词:蒙元货币 第二次货币统一 白银经济 世界经济

JEL 分类号:E42 N15 N20

一、导论

20世纪之前,中国历史上共发生了两次货币统一:第一次是秦的货币统一,将中国货币经济确立在铜铸币的基础之上,进而使东亚逐步成为铜铸币经济体系;第二次是蒙元时代的货币统一,将中国货币经济确立在白银基础之上,使整个东亚进入到白银经济,形成了全球性的白银需求,进而使世界经济得以诞生。

两次货币统一之间,约略相隔1500年,存续着全球货币历史上唯一的大范围、长时段的贱金属货币体系——铜铸币经济,且发展成为同一时期内全球最为成功的货币经济。唐末以降的约三百年间,即公元9世纪末至公元13世纪年间,铜铸币经济达到了其历史的顶峰,并迅速衰败下来,铸币割裂,通货复杂、多变,出现了中国货币史上乃至世界货币史上最为复杂、动荡的货币乱局。

这一史上最大货币乱局肇始自五代以降,究其原因,大体有三:(1)铸币权的割据,导致“货币区”林立。西汉年间,铸币权始统一于朝廷中枢。唐末及五代,国家陷于分裂,各割据势力竞相铸行货币,四川更出现了铁币铸行,币权割裂、币制陷于乱局。北宋有限地统一之后,并没有结束境内的币权割据,反而人为地、制度性设立了“货币区”,出现了所谓的“铁币区”、“铜币区”,以及“兼用区”。两宋也都曾下发铸币权于地方军政首脑,任其滥行通货,以应军需。(2)货币经济的国际化,导致铜币的国际、国内的多重封锁。辽、夏、金,以及日本、朝鲜等两宋周边的国家或地区,各自先后发展出水平参差不齐的货币经济,但都极少铸币,依赖两宋及其前朝铸币的输入。两宋自然竭力限制铜币出境,不惜人为设立铁币区等作为缓冲区,甚或限制铜铸币使用而推行铜、铁不同本位的纸币。通货的国际对峙转化为境内的通货割据与复杂化。(3)商品消费用铜,导致朝廷厉行“禁铜”,加剧“铜荒”。两宋货币经济高度发展与成熟,作为币材的贱金属——铜——的商品化日益加深,其商品价值甚或高出货币价值,形成商品用铜对货币用铜的巨大冲击,出现了所谓的“铜荒”。如果说,唐武宗会昌灭佛有着大幅削减寺庙用铜的考虑,两宋铜经济极度昌盛,社会商品消费用铜已经远

* 周子衡,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经济学博士。

^① 蒙古帝国起自漠北,公元1260年,忽必烈继承汗位,建元“中统”。经阿里不哥争位战争,蒙古体系内部发生分裂,蒙古逐次西征所创建四大汗国,事实上独立于忽必烈。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年号改为“至元”。本文所称“蒙元”系指忽必烈改元前后的蒙古帝国,并非单指“元朝”。

超寺庙经济的铜消费量,且铸行转换铜的商品形态与货币形态在成本上或技术上都不成问题。商品用铜冲击下,朝廷厉行“禁铜”政策,向社会强制征收铜材存量,竭力限制与打击商品用铜增量。禁铜政策不限于两宋,辽金等都曾厉行铜禁,由此,这一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政策,非但没能扩充铜材来源,反而恶化铜荒情势。由此,不得不奉行币材多样化,更大规模、大范围、长期性地行用铁本位或铜本位的“纸币”。

从表面上看,两宋的货币乱象起至“铁币”,乱及“纸币”,但是,其根子还在“铜币”。两宋时期,铜币铸行量达到中国货币历史上最高峰,也是前现代世界货币历史上的铸币高峰,然而,这并不能扭转铜铸币的历史颓势。这一“史上最大货币乱局”标志着,铜不仅不能适应货币经济的国际化发展步伐,更不能满足稳定国内铸币经济的需要。

大范围、长期化的货币混乱与动荡,并没有使得货币经济极大地萎缩,甚或在持续的“铜荒”中,也没有出现通货的紧缩。究其根本,纸币行用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这就说明了,货币将统一于纸币,而非任何金属货币。

作为铜币的堡垒,两宋行钞旨在维系铜币的中心地位,只是在南宋覆灭前几个月匆忙发行了银会子,即便在国内,南宋根本无意也无力运用纸币来统一货币。金朝的纸币政策最为彻底,施行单一纸币通货体制,实现了境内货币统一,且奉行无限期不兑现纸币以满足军事财政等的需索,从两宋的纸币仿行者转变为纸币创新发展的引领者。然而,金朝行钞引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倍受诟病。值得注意的是,金交钞的恶性通胀使得白银成为民间的通货。这些都表明,结束货币乱局的根本路径在于,以银本位的纸币来实现货币统一。

漠北蒙古始仿行金朝推行纸币,但蒙古军事财政却非如后者并充分依赖无期限、不兑现的纸币,中统钞以丝为本,至元钞以文贯做单位,实则以银为本。蒙古行钞代表着东亚货币的历史走向,是货币统一的决定性力量。1234年,蒙古灭金。在此之前,金朝内部的货币统一已经完成,从漠北到华北的货币统一是“纸币对纸币的统一”。1279年元灭南宋后,蒙元开始大量收兑旧南宋纸币,完成了对江南等旧南宋地区的货币统一。

蒙元的货币统一,表面上看,是“纸币对纸币的统一”,根本而言,是白银对铜币及铁币的统一。具言之,两宋时期的货币乱局的历史演进,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各国内部,都遵循大体相近的路线,即自觉不自觉地推行“铸币的纸币化”,并由于纸币的滥发而事实上在民间大幅提升了贵金属的通货地位,也使贵金属境内跨区交易或国际跨境交易成为常态。然而,虽然唐宋时期金银的通货地位不断上升,但是金银总量尚不能满足通货所需,无从历史性地支持大范围、大规模的货币统一。蒙元的货币统一的逻辑在于,铸币的割据演化为纸币的纷立,以银本位纸币收兑其他各类纸币,便水到渠成。简言之,通货统一于纸币,计价统一于白银。

蒙元的货币统一,是分水岭式的货币历史事件,标志着全球最为富庶与发达的货币经济体系——东亚,实现了从贱金属——铜——铸币向贵金属——银——的历史性的大转型。这就使得东亚“铜经济”与亚欧大陆的中西段的“银经济”实现了贯通,白银从区域货币跳升为世界货币。际此,世界经济的发生始具备了货币条件,亦即世界范围的经济活动不再单单是所谓的“长距离贸易”的加总综合,而是贸易、投资等共同纳入到世界性的货币流动中来。

蒙古体系的确立及蒙元货币统一导致的东亚的货币转型是世界经济历史发生的决定性事件或力量。蒙古作为亚洲内陆腹地崛起的军政力量,一伺扩张为亚欧势力,其所确立的蒙古体系就从陆路马帮驼队扩展到水路运河舟楫,进而伸展到远洋航海。蒙古体系将蒙古军事力量、穆斯林财经网络、儒家官僚组织等三股势力有效地加以运用,造就了亚欧蒙古体系。无疑世界历史的最初形态恰恰脱胎于蒙古体系所造就的亚欧大陆,就此,日本学者岡田英弘称之为“世界史的诞生”(岡田英

弘,2013)。

蒙古体系的继承者有三:在西方是俄罗斯,在东南方是明皇朝,在西南方是阿拉伯势力。明继承了元朝的行省制度,以及军户与民户二元分立的社会结构,在反元驱蒙及新帝国创建等逐项事业中,朱明积极地以穆斯林为盟友。穆斯林中亚与西亚则在后蒙古时代持续地西征,将地中海纳为势力范围,并使印度洋海路成为东西方的经济纽带。正是阿拉伯给予欧洲重新发现希腊与罗马,激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进而引发了宗教改革,欧洲——特别是西欧——着力摆脱在后蒙古时代亚欧体系中的地缘劣势,遂有所谓的新航路的开辟与地理大发现的发生。可以说,后蒙古时代,明朝与俄罗斯沦为专制保守性的区域性力量,阿拉伯的扩张与进取刺激了欧洲的觉醒与西欧的出走,这些后蒙古势力决定了公元1500年后的世界历史的基本格局。

然而,新航路与地理大发现并没有改变后蒙古时代所确立的世界格局,美洲须加入到亚欧大陆版本的世界体系,才使其在世界地缘格局中的势能转换为世界历史的动能。具言之,美洲的全球冲击有二:一是白银的洲际流动;二是所谓的“哥伦布交流”带来的农业革命等。前者使明清主导的东亚有了更多的货币,后者使亚洲有了更为庞大的人口。其中,白银的洲际流动是最为直接的、最为有力的世界性经济活动。在美洲,白银基本上就是矿产品,在欧洲,白银是餐具等奢侈品的原料来源,在亚洲,特别是明清、印度,白银才是压倒一切的通货。明清的白银需求与美洲的白银供给是搅动洲际货币流动的世界性力量,只有白银的洲际流动才使世界经济真正成为现实,不仅使欧洲(特别是西欧)逐步替代阿拉伯势力成为世界经济的最为强劲的一股力量,而且使世界贸易与投资得以持续地扩张。

蒙古体系的确立及对其的继承与突破,孕育了世界历史胎动与诞生的巨大势能与动能,改变了世界的历史与经济,进而使亚欧大陆世界体系激变为洲际世界体系。其中,蒙元的货币统一一拔掉了东亚经济中那颗盛极而衰的锈蚀斑驳的铜币钉子,注入了白银纸币,变铜文计价经济为白银计价经济,彻底地打开了白银货币需求的世界性闸口,无疑这是世界经济历史与全球货币历史中至为重要的一环。

二、蒙元统一前的货币割裂

唐朝末年,中国始陷入了大裂解,历经五代十国,北宋与辽以及南宋与金的和平与战争,更似又一个南北朝的大分裂。在蒙古势力南下统一之前,经历了长达约略三个世纪的分裂,货币经济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陷入了长期的割据与动荡之中。期间,货币情势的复杂、割裂与动荡,可谓近代之前中国货币历史之最^①。

(一)分裂的源头:五代十国时期货币的割据性及其延续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便陷入到货币的割据与动荡之中。期间,铸币权的割据性成为一个普遍的事实,不仅各国自行铸行流通各自铸币,此外,更出现了铁钱,这就使金属铸币进一步割裂,中国货币史上最为复杂的多元混杂的货币情势发生了。

从货币历史上看,宋不是唐的继承者,而是五代十国的直接继承者。货币割据的乱象并没有因北宋的出现而有根本性的好转,相反,五代时期一系列“非常态”的货币割据状况,成为之后两宋时期“常态性”的制度安排。两宋的货币割据性并非是针对五代时期货币乱象的无原则的妥协与继

^① 晚清以降,外洋货币大量涌进并流通开来,外资银行亦纷纷在华设立并发行货币,中国才又历史性地再一次陷入到长期、复杂与动荡的货币情势之中,甚或相较本文述及的这一历史时期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

承,更非起自地方军政力量的割据要求,而是朝廷中枢基于国防需要和货币安全的考量,而“故意”为之。可见,宋币的割据性承继了五代时期的货币割据的“遗产”。

五代十国并非归于一统,一则宋大体上完成了华北部分和南方的统一,另则辽、夏、金,乃至蒙古相继自北方崛起,不断南侵。事实上,列国争衡与割据对峙在一个更大的地理空间范围内长期地延续下来。两宋在其疆域内维系并推行货币割据的目的在于,建立与西夏、金等的铸币——亦即铁币——隔离缓冲区,阻止铸币——亦即铜铸币——北上外流。列国争雄,军兴迭起,财政支出压力巨大,对各国货币体系冲击颇为沉重,各方勉于维持,根本无力于在货币重建问题上独善其身。在此长达近三个世纪的分裂与对峙的历史时期内,通货割据的裂度增大了,广度扩展了,时间跨度也延长了,同时货币体系也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

(二)中心的裂化:两宋货币割裂的制度化与常态化

宋的货币乱象是对五代货币乱象的继承。可以说,两宋的货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之后若干个世纪,中国通货的复杂程度也没有超出这一时期,只是到了19世纪,伴随域外货币的大量涌入与不断累积,中国域内的通货复杂程度才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同时,还应当认识到,两宋货币体系对于其周边的影响力十分巨大,一定意义上说,它们都是两宋货币体系或政策体系事实上的追随者^①。可以说,两宋是这一时期东亚货币的中心区,甚或为货币制度与政策严禁的策源地。

两宋时期的通货的复杂性,归结起来,主要有二。

首先,币材的纷杂。

中国货币史上币材的纷呈与杂处的巅峰时期当属两宋,举凡有四:铜钱、铁钱、纸币、作为贵金属的金与银。各自情形,亦颇为复杂,胪列如下:

● 铜钱

据毕沅所著《续资治通鉴》卷1载,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初铸“宋元通宝”,这不是年号钱。太宗载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铸太平通宝,是为赵宋首次出现的年号钱。两宋共计十六帝改五十五次年号,如若连同闽、粤两帝共计十八帝,改了五十七次年号,共铸造四十五种年号钱,六种非年号钱。钱币名称也多样,钱文诸如:“通宝”、“元宝”、“重宝”、“之宝”、“全宝”、“永宝”、“兴宝”、“安宝”、“新宝”、“洪宝”、“万宝”、“正宝”、“真宝”、“崇宝”、“泉宝”、“至宝”、“珍宝”、“隆宝”、“封宝”等等,约略计为三十余种;又有所谓“小平”、“折二”、“折三”、“折五”等类别。除此而外,还应包括钱文书法上的丰富性,可以说,宋钱颇具艺术性,艺术价值很高,是空前而绝后的。若再依大小、等级、币材、年份、成色、特征、版别、钱监、纪念等等及其他标记来划分,诸如年号钱、御书钱、对子钱、胆铜钱、纪年钱、钱牌,等等,种类便不胜枚举^②。

两宋的钱币表面上是复杂多样的,但是其轻重大小并没有大大改变,并不因其外在的多样性而阻碍其流通^③。这就说明了,与汉唐钱制单一而极少变化相比较而言,两宋钱制虽多样复杂,但毕竟变化是外在相对的,而非内在而绝对的。然而,两宋相交,钱制却有大大不同,总体而言,北宋钱币多有变化,而南宋钱币趋于一律,或因南宋铸钱较少,或因北宋私铸较多,不一而足。此外,北宋以铜钱为主,南宋则以铁钱为主;另,北宋以“小平钱”为主,南宋以“折二钱”为主^④。

^① 事实上,只有金朝的纸币实践后来居上,大大在一定程度上而言超出了宋。后文将谈及于此,兹不赘述。

^② 参见千家驹、郭彦岗著《中国货币演变史》。该书于此亦指出“仅仅神宗朝铸的熙宁、元丰两种年号钱,光是版别就各有一百多种”。

^③ 参见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

^④ 参见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

● 铁钱

铁钱起初是私铸的劣币,最迟出现于汉代。东汉初年割据川蜀的公孙述实行官铸,后来南朝萧梁政权亦行官铸,但铁钱行用时间都很短。五代时期,中原政权没有铸行铁钱,但是地方割据势力不乏行用铁钱,主要包括后汉、南唐、闽、楚、南汉、后蜀等。

宋初,仅四川一地行用铁钱,成为铁钱区,其他各地被禁用。之后,铁钱使用区不断拓展,仁宗时期,陕西、河东变成铜钱、铁钱并用地区,进而演化成主要行用铁钱。北宋后期,广南等地铸行铁钱。南宋时期,淮南和京湖地区,新拓展为铁钱区。可以说,铁钱的存续与拓展主要决于朝廷,服务于对外通货割据的战略考量,既减少宋与境外诸国的货币流通,亦即减少铜币的外流。

铁钱的铸行在相当程度上直接与间接地影响了两宋货币体系,或导引纸币的发行,或强化铜币的保守,铁币的铸行与两宋相始终。虽然如此,铁币的主要流通区域不仅人口较铜币流通区域少,地域也相对较少^①。可以说,中国货币史上,大行铁币者,仅见于两宋时期。

● 金与银

历史上,金银曾作为货币,但是其使用的范围颇为狭窄,主要通行于社会经济领域的上层,用于赏赐或国际贸易结算等。两汉以降黄金便逐步退出流通,白银作为通货的情形更为罕见。有唐一代,金银虽未绝于货币,但是大体上已经退出经济最为富庶的内地之一般社会经济生活^②。这个状况在唐末五代时期发生了变化,金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应用开始活络起来,并有了一定的规模。北宋时期,金银始成为通货的一部分。

大体而言,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国际支付盖用金银有非常大项的增加,特别是“岁币”与“岁赐”,以及马匹进口等对外贸易^③;其次,在交纳赋税时,允许一定条件下以金银代钱。在财政支出方面,赏赐、官俸、犒军等亦有使用金银;第三,相对黄金而言,白银在两宋比黄金更为重要。鉴于两宋全国划分了不同的货币区,只有白银和绢才能在全国范围自由通行,是全国性的通货;第四,官籴粮以银。事实上,籴粮以白银计价折算成钱来结算支付,这说明大宗商品的计价结算普遍采用了银,而只是在支付环节尚使用铁钱;第五,宋大量地铸造了金银钱,是历朝历代使用金银钱最多的时期;第六,两宋实行了金银禁,主要是禁止金银的器物化,阻止金银外流,且禁止伪造白银^④。

宋代黄金与白银不仅实现了“回归”,且白银的地位历史性地超出了黄金,成为国内外通行的通货。

● 纸币

以币材视角来确认纸币的渊源,往往溯及到唐宪宗元和初年(公元806年)的“飞钱”,也有上溯到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发行的“白鹿皮币”。然而,若以货币的面值而论,大钱和小钱的极度贬值,虽然币材为铜,但质量轻薄过甚,面额极大,已然悖离来恒定标准重量的铜铸币,而接近后来的纸币来。由此,历朝历代发行的铜铸币大小钱引发私铸、滥铸,进而往往沦为“劣币”,引发

① 参见汪圣铎著《两宋货币史(下册)》。

② “唐时,金在私经济方面,除用于贿赂、请托或由于好意的赠送、布施、谢礼、悬赏、赌博、输财远方、路资、蓄藏之外,又可用以支给高价物品,并用于表示高贵价格。在公经济方面,作为纳税用者,虽只限于私的科征,而为国法所不承认,然可为上供、进献之用,亦可充军费、赏赐等之用。其使用范围,虽多少也流行于下层社会,但仍以上层社会为主。在魏晋前后,金一时似乎已丧失其货币的地位,然至唐又恢复其地位。”(参见[日]加藤繁著《唐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

③ “两宋的“岁币”和“岁赐”,每年要输出白银二三十万两;向辽、金、西夏等强邻进贡。”(参见千家驹、郭彦岗著《中国货币史》)另外,在算请榷品时,官方支持使用金银代钱,在唐代对外购买马匹即使用白银支付,宋对外购买马匹更禁止使用铜钱,以防止铜钱大量外流。

④ 汉代禁止伪造黄金,宋代禁止伪造白银,说明了贵金属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重要。

通胀,而最终回炉销融重铸。事实上,纸币的产生及其命运往往大多类似于此,只不过币材上确有不同而已。虽历朝历代往往有所谓的大小钱铸行,但往往据为特例,并不是通行的案例,而纸币的官方发行往往作为通例,其引发的问题更为突出,亦因此而往往备受时人诟病。围绕行钞与否,往往掀起十分尖锐的朝堂政争。

然而,宋的纸币产生其动因,并不同于大小钱的政策目标,主要是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相应的轻便通货;特别是在跨境、跨地交易时,纸币有助于出入不同的货币区域,规避有关的金属铸币的跨境、跨地流通管制;当然,两宋时期迭次军兴,朝廷军费支出甚巨,财政吃紧,用行钞来弥补开支。

中国最早的纸币是作为兑换券使用的“交子”,其渊源乏考,大体而言,是五代与北宋初年之间。四川交子的产生不晚于大中祥符年间(公元1008~1016年)。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朝廷才设置益州交子务,“官交子”由此而生。崇宁大观年间,将交子改为“钱引”,四川以外的各路在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印制新式钱引,但四川仍沿用旧法。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正式改交子务为钱引务。自此以降,楮币迭次发生,出现了交子、钱引、关子、会子,等诸纸币,不一而足。

两宋的纸币种类并不单一,大体而言,有以铁钱为本位的“交子”。也有以铜钱为本位的“会子”,以及以银为本位的“银会子”。另,南宋初推行的“关子”(也曾一度改为“交子”)较为复杂,大体分为三种:实物本位,即换领“茶盐香货钞引”的“关子”;或换其实物的“公据关子”;或以白银或铜钱本位的“现钱关子”。大体而言,南宋最为通行的是“会子”。此外,还有地方发行的纸币,如,淮交、湖会、小钞、关外银会子、关外铁钱会子,等诸地方纸币,不一而足。

其次,货币区制度——人为地“割裂”。

币材的多样化或纷杂,呈现出地区的差异性,这是中国货币史上所仅见的。这是人为的安排,并非是“自然”地形成。

宋代币制呈现出地方割据性,这是五代十国时代的遗产。然而,宋开国统一之后,它很快成为朝廷中枢刻意作出的制度安排,目的恰恰在于限制货币流通,主要就是防止铜钱地外流。

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个货币区内实行不同的货币制度,这就终止了货币全国性的自由流动,这是史无前例的。严格的说,这种情况在两宋之后的中国也没有出现过,可谓是“空前而绝后”。究其原因在于,这是一种朝廷中枢的体制性决定,而并不是地方割据势力的割据行为所导致的。

两宋货币区制度的直接诱因是铁钱。北宋剿灭后蜀,将已推行铁钱的四川地区进一步推向铁钱通货体系,而将大量的铜钱聚敛并输出四川。宋仁宗时期,西北军兴,对西夏和西番用兵,陕西、河东靠近战区的地区开始铸造并推行铁钱,这两个地区就成为铜钱、铁钱并行的货币区。铜铁兼行涉及到兑换率,官定比价使得铁钱较高,于是格雷欣法则发挥作用,铁钱长期挤压铜钱,而使其更倾向于铁钱货币区。南宋抗金也采取了货币分区政策,重点在于防止铜钱流向长江以北,且初行铁钱利润丰厚,于是,将淮南、京湖地区划定为铁钱区。

铁钱扰动了金属铸币,促成了货币区体系;同时,纸币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亦即交子、钱引、淮交等以铁钱为面额标示的纸币,以及以铜钱为面额的会子,进而出现了所谓的银会子,这些纸币的流通也受到相应的限制。

人为实行钱币分区,这是我国货币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现象。虽然钱币分区基于朝廷的国防大计的考量,但是不乏官员逐利而滥铸铁钱形成的恶果,北宋时期陕西、河东以及南宋淮南长期处于币制混乱盖出于此。钱币分区导致了相应金属本位的纸币的出现,这些纸币的跨区流通也受到局限;钱币分区导致区域间经济交流不便。当然,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实施货币分区政策必然的代价,

甚或是这一政策直接或间接的目标所在^①。

(三)外围:更大地理范围的货币割据与动荡

宋周边各国或地区,货币自主性是较差的。原因在于,一是货币经济发达程度大大落后于宋,且相当程度上依赖对宋的货币经济联系;二是铸币能力普遍低下,往往直接依赖宋币以及前朝的旧币;三是在货币创新以及货币政策方面,往往是宋的追随者。关键在于,宋与周边国家或地区对货币关系本质是,以邻为壑的“货币战争”,东亚陷入更大地理范围的货币割据及货币资源的争夺与反争夺。这些无疑加剧了货币情势的动荡乃至引发局部的货币崩溃。

辽朝货币

契丹开国早于宋,含西辽在内,享国二百八十年。五代时期,渐趋汉化,始进入货币经济阶段,始铸钱^②。但是,辽钱全用汉字,形制上也仿唐宋钱。然而,辽铸钱少,辽故地所出土的钱币基本上都是宋钱。辽货币经济虽有一定发展,但总体来说,契丹人依然保守着实物经济^③。辽钱币种简略,没有铸行铁钱,也没有发行纸币,但也如宋控制铜币外流,实行钱禁和铜禁。

西夏货币

党项族首领元昊于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称帝建国,国号大夏。西夏南平王宝义二年(公元1227年)亡于蒙古,共计十帝,享国一百九十年。西夏以铜钱为主,兼用铁钱,少量用银。偏远地区始终维持着实物经济。西夏使用的铜钱主要以宋钱为主,也实行了禁止铜钱外流政策,设置了铁钱货币区,以阻隔防范铜币出境^④。

金朝货币

女真人曾臣属于辽,后建国,并联宋灭辽,随即灭了北宋。宋人南渡建立南宋,与金南北对峙,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大分裂。金初使用宋辽旧币,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南北议和后,金始发行纸币,之后,铸造铜币。

金钞法本来有所谓的“七年釐革”的制度,即七年为限,到期换领新钞。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取消了该制度^⑤。宣宗贞祐三年(公元1215年),金交钞贬值,金人禁令停铸铜币,直至亡于蒙古,终未解禁。

铜钱始终未能成为金朝的法定主币,在金朝最后二十年,甚禁止用钱而专用钞,结果大大地促进了白银的流行,支付物价亦以银为主^⑥。可以说,金的白银通货地位高于南宋,使用也更为广泛。章宗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金铸造“承安宝货”银锭,从一两到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钱二贯,

① 南宋时期,诗人陈造写《钱弊》一诗批评钱币分区对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的不良影响,诗云:“为家重重垣,为货须货殖。扬庐国百户,东南赖控扼。淮民鱼米余,百货仰殊域。用铜防外泄,用铁乃奇画。一利伏一弊,救弊要得策。持货贸官券(官券指会子,当时淮南百姓向内地人购买物品要用会子,有时纳税也要缴会子),舍此莫衣食,块处断贸易。计铁取券直,十才取六七……”(《江南长翁集》卷六),诗人刘过也愤然写诗道:“淮民穷到骨,忍复椎其肌?不知铁钱禁,作俑者为谁。行商断来路,清野多流离……”(《龙洲集悲淮南》,转引自:汪圣铎著《中国钱币史话》)。

② 据《辽史》卷六十《食货志》载,太宗(德光,公元927~947年)曾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铁钱。辽年号钱中天赞通宝(公元922~924年),为宋代洪遵(公元1120~1174年)所著《泉志》一书提及,是足为信。

③ 《辽史》卷三十《天祚皇帝纪四》:“保大五年……初令群牧运盐浙仓粟,而民盗之,议籍以偿,雅里乃自为直,每粟一车偿一羊,五车一马,八车一驰。左右曰,一羊易粟二斗,且不可得,乃偿一车。”这说明了,辽末期,交易或支付依然使用牲畜。

④ 据西夏故地六十多处窖藏钱币统计,北宋钱多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有的甚或高达百分之九十七,而西夏钱不足百分之二,且以“天盛”“光定”钱居多。说明终西夏之世,在其境内主要流通北宋钱币。参见牛达生著《西夏钱币研究》。

⑤ 60年后,南宋会子才取消分界。因此,金钞取消分界制度标志着全球货币史上无期限纸币的发生,是为划时代的事件。

⑥ 参见[日]加藤繁著《唐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

“公私同见钱用”^①。这在货币史家彭信威看来,是汉武帝以来第一次正式以白银作为货币^②。由于恶性通胀,民间已经弃用交钞而专用银交易。在金濒临灭亡之际(哀宗天兴二年,即公元1233年),还发行了“天兴宝会银钞”,是为世界货币史上最早的以银为本位计算的银钞。

终金一朝,货币情势大体如南宋,亦曾钱荒,而采用铜禁和钱禁。所不同者,白银正式作为通货使用,纸币不分界发行。在金朝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中,前后使用过四种货币:铜钱、铁钱、纸币和银币。铁钱和银币的使用范围不大,时间不长;铜钱和纸币是主要的通货。金朝后期,铜钱被废除,纸币交钞成为唯一通货,可以说,金开辟了历史上第一个普遍使用纸币的先河。

金朝的货币体系为蒙古作出了示范。蒙古势力正是沿袭金的货币体系而以纸币统一整个东亚大陆的货币体系。

这也说明了,周边地区与两宋体现了货币历史发展中的共同性或现实的共通性。其中,最为醒目的是金朝的货币体系,金本来也是宋朝货币制度体系的追随者,然而,它最终走向了独立的货币体系,亦即发行无限期的不兑现纸币。可以说,在整个的东亚货币体系中,金的货币体系走向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是,金并没有能力持续地稳定其货币体系,遭受到恶性通货膨胀地摧残。但是,这并不影响蒙古势力对其的仿效。

其他周边区域,以及日、韩、越南等诸货币状况

据《宋史》卷四九零《外国传》及卷四九二《外国传》等分别记载,龟兹、西番唃廝囉诸部等周边区域的社会经济大多停留在实物交易或实物货币阶段,西域或以绢为通货。

据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卷十九《食货志五》记载:“日本显宗(公元485~487年)时期始造银钱,式如铜钱。后历十八世二百余年,至文武帝乃造铜钱。元明嗣位之和铜元年,银、铜并铸,文曰和铜开珍。帝大炊时复造金钱,有文曰开基胜宝。同时造铜钱,曰万年通宝”^③。日本曾铸有银币、铜币、金币,但主要用铜币,大体为十二种。日本自身很少铸钱,亦如辽、夏、金多用唐钱、宋钱,后甚及明钱、清钱币。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宋史》卷四八七《外国传》记载,北宋时期,高丽用米布交易,不用钱。元丰六年前后,过渡为用米、银交易,依然不用钱。北宋崇宁后,高丽“……始学鼓铸,有海东通宝、重宝、三韩通宝等三种钱,然其俗不便也”^④。这就是说,朝鲜半岛铸造铜钱在用银之后,且行用不便。

南洋、南亚各国大多以金银为通货,也有个别国家或地区用合金的。

(四)东亚货币割裂的实质及其趋势

东亚货币体系的割裂表明,货币经济大发展使地缘货币关系日趋紧张乃至冲突,进而使得整个东亚地区的货币关系普遍陷于脆弱。北方不断崛起的军事强权与南方发达的货币经济之间,呈现出日趋严峻的力量不平衡,这也使得货币的割据性难以长期维系,必然伴随大范围的政治统一,启建货币一元化进程,进而实现货币统一。

三、货币的统一:一个币材的视角

如何研判货币统一的问题?有两个视角可选,一是谁来统一?二是如何统一?前者关乎政治、

① 参见《金史》卷四八《食货志》。

② 参见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

③ 参见黄遵宪著《日本国志(上册)》。

④ 参见洪迈著《泉志》。

军事之历史,至多仅关乎币权的统一,取消货币割据,是为货币统一题中应有之义,本文从略;后者则关乎货币经济自身,根本来说,亦即货币统一于何种币材?

(一)“铜币”——面临退出主要通货的历史性压力

两宋货币问题的本质在于,铜币的极盛而衰。

直言之,铜是问题的症结,而非解决之道。两宋是中国历史上铸造铜钱最多的朝代,并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以铜钱为主要通货的朝代。北宋时年铸钱数额大都远超百万贯,最高年份铸钱数额接近500万贯。“这是中国历史上可能时空前绝后的。”^①众所周知,元明清三代铜币或曾被禁用,或以白银为主要通货,铜钱沦为次要通货。因此,两宋是中国乃至世界货币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铜铸币的巅峰时代,也是铜币最后的辉煌时期。

应当说,两宋的铜铸币事实上是盛极而衰的历史阶段。其衰败,恰恰来自于铜本身的约束。两宋商品经济大发展,以市贸而论,唐的管制市非常严格的,两宋则出现了早市、夜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成熟远在唐之上。货币经济由此也颇为兴盛,唐时代所推行的绢帛等实物性的通货退出了流通^②,铜铸币大大兴盛起来,出现了史上的铸钱高峰。这也促成了两宋朝廷竭力促进铜进入到通货领域,而禁止其私藏或铸造器物,更禁止铜币外流到境外去。这个政策就是所谓“铜禁”。

铜禁政策其来有自,可上溯到西汉^③,下及唐、五代^④,铜禁渐次成为常态,发展成为国策。两宋的铜禁是这一国策体系的沿革与大发展。根据《宋史·食货志》、《庆元法条事类》、《宋会要辑稿》等文献,两宋等铜禁政策大体集中在:首先,从源头控制铜,禁止私人采炼、占有原铜,这就意味着,新增铜尽归官方;其次,限制铜的使用,禁止制造铜器,这就意味着,不会出现铜器与铜钱争夺铜料的状况;再次,禁止铜输出境外;第四,禁铜范围拓展到铜合金——鎏石和含铜矿物——卢甘石;第五,相应采取了铅禁与锡禁,目的在于管控整个的铜钱铸造产业的原料来源;第六,钱禁,主要有四,禁止私铸、私销、出境、过量窖藏。虽有王安石新法短暂解除铜禁,很快恢复了铜禁政策,且仅北宋便发起了三次大收缴铜运动。总体来说,铜禁政策的作用还是显著的,亦即朝廷全面控制铜铸币取得了基本成功。

然而,两宋强有力地控制铜铸币及其产业运营,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铜荒”。正是由于官府严厉地控铜,使得铜价不能反映出真实的市场供求状况,往往偏低或过低,这就引发了私铸铜器、大量窖藏、走私出境等暗潮汹涌澎湃。这种状况进而愈演愈烈,大范围长期的铜荒出现了。两宋之前,也曾发生私铸、私销的问题,但主要针对的是铜币的标准重量的界定,亦即:如果官定铜铸

^① 参见汪圣铎著《两宋货币史(上册)》。据《汉书·食货志》:“自孝武元狩五年(公元前120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公元1~5年),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据沈长云《汉代史籍中的“亿万”、“巨万”究竟指多少》,成钱280亿万应为280亿。根据汪圣铎先生推算,西汉在这110多年中,大约平均每年铸钱2~3亿枚(时,铜币以枚来计算,而非贯,换算成宋钱大体为20~30万贯)。《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盈百万。”由此推算,唐代铸钱最多时每年超过百万贯。但是,唐代通货中铜钱虽为主要,但是其他通货特别如绢帛大量使用,商品经济不如两宋发展,因此,这个数据是值得进一步考证的。汪先生认为,唐代铸钱最多是在天宝年间的32万贯。

^② 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正是铜铸币的大发展才使得实物性的通货历史性地退出了流通。之后,实物性的通货不再作为常态,而仅仅作为特例而偶然出现。

^③ 《汉书·食货志》逐项列举了贾谊主张朝廷垄断采铜的益处,但是否被采纳不得而知。

^④ 《唐六典》卷三十司土参军备注,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公元719年)推行了私人采炼之铜一律由官方收购的政策;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历代制度评说》卷七《钱币》记载,开元十七年,铜锡铅一律官方收购,禁止私造铜器;后有解禁,据《册府元龟》卷五十一《邦计钱币》以及《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再次禁止新造铜器,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再次明令铜官方收购,且“除铜镜外一切不得铸造及私相买卖”。据《旧五代史》卷四六《食货志》及《五代会要》卷二七《泉货》记载,五代时期亦推行铜禁政策。

币过重则发生私销，官定钱币过轻则发生私铸。但并不至引发大规模的、持久的铜荒。就是说，总体而言，铜铸币是稳定可依赖的通货。

铜禁导致铜荒，标志着朝廷中枢管理通货体系趋于总溃败，货币区制度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政策倾向，它虽延缓通货总失败，却亦将通货的溃败引向纸币一端。与强化国防与支持战争的财政扩张性支出相结合，管制贱金属的失利，不得不依赖纸币的不断超发。

两宋货币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弃铜”。

宋币问题的形成，是历史性的，是货币经济大发展的产物。宋币表面上是铁币问题，症结在于铜。这表明，贱金属长期历史性地承担法定主币走到了历史的巅峰，难以为继了。

铜荒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并非是一个资源性的问题。将铜限定在通货领域，而不能作为器物，这就极大削弱了铜的市场供给，拉升铜作为商品的价格，导致铜禁政策失败。如果放松宋铜的管制，会发生大量的铜流失出通货体系，从而极大地动摇铜的主要通货的地位。这就表明，铜已经无法充当稳定的通货币材来源。

由铜所引致的一系列的货币问题，最终形成了东亚货币割裂，这就标志着，贱金属作为主要货币的模式盛极而衰了。弃铜事实上已经成为东亚地理大范围的货币经济的历史性走向。全球来看，只有中华帝国最早使用贱金属——铜作为通货，并由此取得了货币经济的长期持续的发展、成熟与进步。事实上，全球而言，贱金属长期地承担主要通货的案例也唯有中华帝国。铜无法承担持续扩张的货币经济的需要，无法满足国际货币的需求，更无力担纲世界货币。

铜不是东亚货币统一的选项，相反，东亚货币统一正是要实现“弃铜”。

(二)铁币——过渡性通货，面临全面的退出

铜币不足，铁币来做补充，但是因其价廉体重，而诱发了纸币的产生。由此可见，铁币本身就是一个过渡性的通货，它缓解了铜币的部分现实压力，但它带来的却是更为混乱的通货局面。铁币不仅不能长期地局部地替代铜币，而且其自身也难以有效地流通，必须借助于纸币。

当纸币因铁币过重而产生后，纸币便不易受禁于铁币的局限，依托于铜币或白银，同样可以行用纸钞。纸钞行用不限于替代铁币，现实中，铁币于计价方面亦无所长。这就表明，铁币于通货或计价货币，均不占优势。这就意味着铁币是过渡性的通货，纸币滥觞之后，铁币便面临全面地退出货币体系。

(三)白银——胜出黄金，但总量不足

唐宋白银的产量均有所增加^①，且白银载标示物价方面较钱文更趋于稳定。南宋始，白银和黄金的产量都有下降，且民间的窖藏增多，亦有黄金自日本等输入，更不再向金输出贵金属。自唐宋至元，白银相对黄金而言，不仅数量更多，而且在通货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渐趋凸显，可以说，白银胜出黄金在此期间称为定势。

这就决定了，白银最终替代铜成为主要通货的货币历史走向。然而，白银受限于总量不足，中国产银但有限，不足以发生白银对铜铸币的替代。因此，白银尚不能作为货币统一的币材依靠。由此，铜的退出主要通货与白银成为主要通货两者并不能同时发生，必然是不同的历史进程，难以相互诱导、相伴而生。

^① 《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载：“元和初天下银冶废者四十岁，采银万二千两……及宣宗……天下岁率银一万五千两。”由此推算，唐代采银，每年大体一、二万两。宋银产量大增，据《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阡冶》、《宋会要辑稿·阡冶》、《文献通考·征榷考五·阡冶》，以及《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二《阡冶》等书记载而推算，每年采银十数万到数十万两。另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一六《财赋三·金银坑冶》：“祖宗时除沙石中所产黄金外，岁贡额银至一千八百六十余万两。”由此克制最高年份的采银数量。

(四)纸币——渐趋成为主流通货

在蒙元货币统一之前,先后发行了以各种金属为本位的纸币。这就决定了金属通货的运行事实上已经并可以通过纸币的行用来实现。这就是说,金属通货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反映在相应的纸币之间的关系,易言之,纸币之间的关系也反映了相应的金属通货之间的关系。由此,不难发现,蒙元统一前,纷杂动荡的货币关系中,纸币已经渐趋成为主要的通货,只是有着不同种类的纸币而已。

纸币替代铜币。

古文献言及纸币,大多溯及唐之“飞钱”,甚或远追西汉武帝时代的“皮币”。这些判定大多基于一种币材的视角作出,认为动物的皮革或纸质汇兑凭证更接近于纸币的产生。若从通货自身的特点来看,所谓的大钱或小钱,就已经非常接近于后来的纸币了。大钱之大已经远远超出单枚大钱基于自身铜重的价值了,小钱之小,也是同样的状况。那些或浮于水面,或一握便烂的铜铸币,与纸币的形态同样便是非常地接近了。应当说,铜币减重达到如此“惊人”的地步,以更廉价的纸质材料等来替换之,技术上不再是个困难。只是铜币极度地减重,依然可以回炉,换言之,铜币毕竟有一个总的量的约束,而纸币没有这个总量约束。宋的“禁铜”政策,事实上就在于确保铜的总量用于通货的铸行。这个政策不奏效,自然以纸币替代铜币的条件就初步具备了。

纸币替代铁币。

铁币无须像铜铸币一样发生严重的减重问题,原因在于,铁的价值本就不高,大规模的减重,缺乏价值基础,无异于铁币地退出。作为贱金属,铁币只能在金属范畴外寻找币材的替代,关键是这种替代并非价值性的,而是权益性的,这似乎很自然的找到了“纸”。传统上,在中国纸币被称为“楮币”,楮是造纸的木材,因此大多历史时期均称纸币为楮币。换言之,纸币的名称或概念是很晚近的事情。

北宋纸币源于“交子”。大体而言,两宋的纸币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是纯粹的私人自由发行,并无“交子”字样,实际上是一种凭据,算不上通货;之后,成都十六家富商成立交子铺,亦即“交子户”,联合发行交子,形制划一,且遍设分铺,交子得以远近行使并得兑换,此商用交子已然具备通货性质;再后,由于交子行用引发争讼,设立了交子务,交子收归官办^①;第四个阶段是所谓的“钱引”^②时期,这个时期经历了南渡,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纸币的发行开始宽滥;第五个阶段关子^③、会子^④的行用,通货膨胀始长期化,并持续地恶化。

南宋后期,人均纸币几贯十几贯,一方面表明纸币通胀的态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纸币对于经济生活的渗透已然全面而深入。两宋时期,纸币从无到有,渐次发展,已经较为彻底地改变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面貌,财政对于纸币的依赖也是越来越强,在大宗商品贸易中,纸币已经取得了主

^① 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十一月,朝廷批准设立益州交子务,官交子始行用,仍旧沿用民间习惯,为两年一届。官交子是以现钱兑换流通券,性质有似本票。鉴于官交子已经由商交子“书缙之数”过渡为“自一贯至十贯文”如此的固定的面额,是为保证兑现的纸币,世界最早的纸币诞生了。

^② 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将纸币定名为“钱引”,除闽越湖广外,在各路发行。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将交子务改为钱引务。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改四川交子为钱引,不置抄本,旧交子不许兑换。

^③ “关子”始于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有“现钱关子”、“公据关子”、“内关子”、“金银见钱关子”等,各自行用期限或特点,不一而足。

^④ “会子”始于南宋初期,起初为民间所用的“便钱会子”,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改为官办,由两浙推行到两淮、湖广、京西各路。会子发行本无限量,行用数量巨大,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设定三年为界,每届以一千万贯为限额,但是,每贯价格走低,且朝廷努力维系官价,并行展期,流通量膨胀迅速,官价难以维系。南宋末年,战事吃紧,会子滥发到状况已然到了无法收拾到境地,通货膨胀使得一贯会子不及一文。

要通货的地位。由此来看,虽然受到通货膨胀的冲击,纸币在财政、大宗商贸,以及普通民众的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强,成为最主要通货的趋势已然形成。

货币的统一之于纸币,旨在削减不同种类纸币,直至单一纸币的出现。实践中,即以一种纸币持续收兑其他种类纸币。依据兑换比例所展开的收兑活动,事实上是将被收兑的“旧币”大量地折算成“新币”,折算的过程,亦即确立新的计价货币的过程,收兑则可以视为新计价货币的“再发行”。

四、蒙元的货币统一进程

蒙元的货币统一进程主要有三:一是收兑金朝的纸币,实现华北、漠北与西北的货币统一;二是收兑旧南宋的纸币,是为整个货币统一进程中的最主要部分;三是巩固元纸币行用。这一货币统一进程,主要体现为纸币的统一,针对流通中的金属铸币的统一措施亦于其间得以实施。

(一)金元的货币统一于“纸币”,奠定纸币统一的总基调

蒙古统一华北之前,金朝货币日益向纸币集中,而禁绝其他通货流通,这也可以理解为金内部货币的先行统一。金的货币统一表面上是统之于交钞,实际上,通货的根基已经显现为“银”,即银作为计价货币。

北宋时期,主要货币是铜钱,纸币是铁币的替代物,其流通是暂时性的、局部性的,大体而言,使用纸币者主要是官僚、士兵和商人。金与南宋对峙时期,南北双方的纸币发行都有扩张。金的纸币发行扩张非常迅猛,世宗初期,军费浩繁通货紧缺,纸币便多用于军费;及至章宗时期,纸币自由发行。泰和三年(公元1203年),朝廷准许交钞在全国用于纳税。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朝廷采纳了户部尚书高汝砺的建议,颁布了《钞法条约》,是为纸币有史以来第一部约法。泰和八年(公元1208年),小钞在全国通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央发钞、全国行用的统一纸币。

可以说,金率先用纸币实现自身的货币统一,这是其王国最后二三十年间的基本货币格局。然而,金的恶性通货膨胀随之也在全国发生了,宣宗元光元年(公元1222年),金发行“元光重宝钞”,一贯当值通宝五十贯。两年后,元宝泉钞不再流通。民间白银与交钞比价上涨了六千倍。民间遂拒绝用钞,完全用银交易^①。至此,金朝的恶性通胀一发而不可收拾^②。金发生恶性通胀的原因之一,朝廷中枢将纸币的印造权转予地方军事机构,如此竞争性的自由发行纸币就势所难免了,纸币的滥造、滥发。金朝又全面禁止铜钱的使用,结果是银成为最终取代纸币与铜钱的主要通货。

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占据华北。蒙古将华北作为贵金属金银的来源地,而大行搜刮,并将收刮来的部分贵金属用于其与西亚的经往来所需。初,蒙古运用华北的汉人武装割据势力来维系金故地的稳定,亦将纸币的印造权赋予之。忽必烈即位后,将政权基础南移到华北地区,需要稳固的财政根基,需要统一华北的通货,以统制价格与物流。大体来说,蒙元在华北统一通货,选项不外白银、铜钱、纸币三项:华北少铜,铜多分布于南方,是南宋通货的势力范围;华北虽流通有银,但矿藏不足,白银是西亚通货的势力范围;华北虽受金交钞通胀之害,但是纸币滥觞于此,行钞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具备的,换言之,华北是整个东亚地区纸币最为成熟与发达的区域。

中统三年(公元1261年)初,爆发山东李璡之乱,七月被剿灭。这是蒙元华北民族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朝廷开始启用色目人执掌财政,将华北汉人世族的印造纸币等财政权力全数收回中央,同

^① 参见李跃著《楮币史说》。

^② 据《金史·食货志》记载,“其间,易交钞为宝券,宝券未久变作通宝……通宝未久复作宝泉,宝泉未久织绌印钞,名曰珍货。珍货未久复作宝会,迄无定制。”如此,“先后轻重不论,民益眩惑”,终于导致“金祚讫矣”。

时禁止汉人世族一人兼任民政、军政官,兵民分治,一族同涂。次年,实行迁转法,阻止汉人原籍任官。这就表明,李璫之乱后,蒙元实行了华北体系的蒙古体系化,亦即一元性的中央集权统治。正是这种政治的重大变革,财政货币体系也跟进实行了中统钞的货币统一步伐^①。据《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中统三年七月戊午条记载:“敕,私市金银、应支钱物,止以钞为准”。财政支出方面,一应军政均以中统钞。据《元史·食货志》至正八年(公元1271年)中统钞印造岁额为47,000锭,半数以上发给了河南行省,亦即2860000锭(折合143万贯),用于对南宋作战。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五月始在燕京,次年正月相继在各路设立平准库,总领通货兑换,禁止黑市,强化金银的回收。中统钞在最初发行的十余年间非常成功,币值稳定^②。如此,实银大量回收,中统钞发行的白银保证具备了,银之重量单位不再重要而渐次转化为纸币的货币单位^③。

(二)漠北及西北行用纸币^④,货币统一的总趋势得以奠定

早在灭宋之前,蒙元既在至元九年(公元1273年)五月在和林设置了转运司,提举了交钞使^⑤。至元十七年三月设立了畏吾境内交钞提举司^⑥,这便使蒙元纸币推行到西北,将中亚方向的通货纳入到蒙元发行的纸币体系。大体来说,在南宋故地实现货币统一之前,漠北和西北已经实现了纸钞的行用。际此,蒙古本部、西北和华北连成为一大片的纸币通行区,亦即在蒙元的实际控制或管辖区推行纸币,称为一大不可逆转的趋势。由此,军政统一必然带来货币统一于纸币。

(三)收兑南宋纸币,实现元与南宋的货币统一

元朝吞并南宋后,将统治华北时代确立的货币政策,在旧南宋领地内实施。但是,这一实施的进程却不是一蹴而就的。

南宋内在的货币割裂

与金朝不同,南宋没有实现自身的货币统一,大体来说,分为三个货币区:第一,江北指定为铁钱、纸币使用区域。纸币包括:东南会子、淮南会子、湖北会子;第二,江南指定为铜钱、江南会子使用区域;第三,四川大规模使用钱引,铁钱铸行数量不断趋于减少,在绍兴至隆兴年间,纸币已经成为主要通货,可以视之为纸币区。

首先,南宋在江北地区推行铁钱,并不成功,反遭致失败,由此纸币的使用大幅增加了,成为江北主要的通货。这种状况便接近元统一华北前的货币情势了,这对于将江北纳入蒙元的专用纸币的通货体系起到了积极作用。其次,在江南也发生了类似的状况。南宋本来实行钱会中半制,但是,这一制度削弱了铜钱的通货地位,加速了铜钱的窖藏、外流与私销。这进而促使铜钱的价格不断走高、铜钱减少,进而会子也因此大幅贬值。这就使得朝廷回收会子的策略陷入困境,于是在财政收入方面渐次减低铜钱的比例,提升会子占比,甚或全用会子缴纳。如此钱会中半制就垮塌了。会子的使用量由此激增,江南会子长足发展,深入到农民阶层。江南纸币畅行而铜钱减少,这些都为元

① 需要说明的是,中统钞的发行与使用并没有遵循“子母相权”的惯例,原因在于,李璫之乱后,色目人执掌财政并不恪守“子母相权”的学说,原本效仿金、宋,日后发行铜钱,与中统钞并用的计划被人为地搁置了。

② 吴澄所撰《吴文正公集》(又名《支言集》)卷四十三《大元故御史中丞赠资善大夫上护军彭城郡刘忠宪公行状》中称:“中统建元,王以道执政,尽罢诸路交钞,印造中统元宝(交钞)……行之(中统钞)十七八年,钞法无少低昂。”

③ 关于忽必烈在京兆发行的交钞标价中使用银的重量单位,在《牧庵集》卷二十六《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太保太子太师中书右丞相史公先德碑》中可见。

④ 日本学者前田直典所著《元代钞之发行制度及其流通状况》对该部分有较为充分的阐释。

⑤ 据《元史》卷七《世祖本纪》,至元九年五月戊午条记载:“立和林转运司,以小云失别为使,兼提举交钞使。”

⑥ 据《元史》卷一一《世祖本纪》,至元十七年三月辛未条记载:“立畏吾境内交钞提举司。”

以纸币统一通货作了铺垫。第三，南宋在四川对金作战的建炎至绍兴年间初期，地方军政长官诸如宣抚使和制置使等掌握了钱引的发行权，纸币滥发的情况出现了。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朝廷设立了总领所，将钱引的发行权收回，也剥夺了宣抚使的财政权。绍熙年间，总领所的发钞权被归地方军方辖制，开禧用兵时，发行钱引八千万贯，造成物价下跌。嘉定年间后半期对北战事频仍，地方军事当局滥发数以亿贯的纸币。此种情况依然是金朝末期纸币滥发的再现。与此同时，铁钱的铸行数量远远不足，滥发的纸币开始挤压铁钱，使其大规模退出流通。金朝通货崩塌的景象在四川出现了。这为元的货币统一作了铺垫。

统一旧南宋地区货币的基本进程

总的来看，南宋富有铜、铁，其纸币与贱金属通货之间的关系维系要更长久一些。但是，军兴不断，战事频仍，这便促使了纸币发行的剧增，进而导致中枢失控，地方滥发，纸币对于贱金属的全面挤压形成了，纸币最终成为南宋的主要通货。元将华北的货币政策推行到旧南宋地区，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货币统一。

蒙元南侵，宪宗七年（公元1257年，南宋宝祐五年）占领四川成都，四川率先使用中统钞^①。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元军攻陷襄阳、樊城后全面南侵，三路总攻南宋。大体而言，兵锋南下之际，依然许可使用南宋纸币不做更改。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开始考量将华北等货币政策南下推行^②。起初，元不想回收南宋纸币，而直接将割据势力等纸币废弃。后来，改变了方针，使用中统钞来回收南宋纸币^③。

首先，对于旧南宋地区的货币统一目的在于，服务于南北经济再统一的需要。蒙元南向统一，并吞金、宋，恢复了中国南北经济的交流。忽必烈称制建元，强化了蒙古体系的南向策略，元定都北京，是第一个脱离黄河流域的统一朝代。如此，政治中心和南移了的经济中心出现了脱离。元朝实行了两项政策：一是在原大运河基础上，新开挖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使东南物资得以通过运河北上直达京师，比隋朝大运河缩短了九百公里^④。二是开辟海运航道。江南对京师的供给，主要是通过海路运输粮食。这种状况不断演进，元朝于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以后放弃河运，迅速地转为海运^⑤，成为后世漕运渐次为海运替代的嚆矢。如此，元朝在金与南宋就迅速地掌握了物资的调配权力^⑥，这就极大地强化了元对中国南方的经济整合能力，以利货币的统一。

南北贸易复兴，更需要实现通货的统一。南货北上，但是华北物产能南下者却十分有限，如此，南商便须携北钞南归，再行兑换为南钞，殊为不便，累积下来，必然重创统一后的南北贸易，动摇蒙元经济南倾的策略。如此，必须实现南北通货统一。《元史》卷九《世祖本纪》，至元十三年（公元

① 《元史》卷八十六《百官志二》中记载，“西川行枢密院，中统四年始置，设官二员，管四川军民课税、交钞、打捕鹰房人匠及各投下应管之公事，节制官吏诸色人等并军官迁授、征进等事。始置于成都。”可见中统钞事宜已然称为既定行政事宜。

② 《元史》卷二零五《阿合马传》记载：“（至元）十二年，伯颜率师伐宋，既渡江，捷报日至。世祖命阿合马与姚枢、徒单公履、张文谦、陈汉归、杨诚等，议行盐、钞法于江南，及贸易药材事。”

③ 同上，记载，阿合马奏：“枢云：‘江南交会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云：‘伯颜已尝榜谕交会不换，今亟行之，失信于民。’文谦谓：‘可行与否，当询伯颜。’汉归及杨诚皆言：‘以中统钞易其交会，何难之有。’”世祖曰：“枢与公履，不识事机。朕尝以此问陈岩，岩亦以宋交会宜更换。今议已定，当依汝言之。”

④ 参见程民生著《北方经济史》。另据苏天爵撰《元朝名臣事略》卷二《丞相淮安忠武王》中有记载，“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蕃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

⑤ 据《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海运》，以及《大元海运记》上卷。

⑥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四月元朝令不得妨碍从江南携带物资来大都贩卖的客商活动。据《元史》卷九《世祖本纪》，至元十三年四月庚午条中有如下记载：“敕南商贸易京师者毋禁”。

1276年)六月己巳条记载:“置行户部于大名府,掌印造交钞,通江南贸易。”这表明南北贸易中中统钞作为回货输往南方。中统钞由此增发一方面刺激了南北贸易,另一方面对于南北的货币统一产生了通胀压力。

第二,行用库、平准库等制度的确立。蒙元东西贸易用实银,且存在大量的借贷套利活动。蒙古与西亚的经济往来盖用白银,特别在色目人执掌了华北乃至蒙元的财政权力后,扩大了同中亚西亚的白银往来,通过高利息大量从华北等地输出白银到西亚牟利^①。这就使得蒙元体系中的南北经济往来只能采用纸币,而难以获得贵金属的支撑。这就要求朝廷必须严厉控制纸币到汇率,以稳定经济。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在江南设立平准库,平准库相当于兑换机构,而中统钞被规定以金银兑换储备金,金银积蓄在平准库。

第三,禁止江南民间使用铜钱、金、银。蒙元南下之初,准许民间使用铜钱,但当回收、交换纸币,完善相关运作机构后,于至正十四年(公元1277年)四月,骤然在江南禁停金属通货行用。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二月、八月先后下令回收铜钱^②。朝廷中枢判定,持续允许铜钱等金属通货等行用,将冲击到纸币流通的稳定性,因此必须断然禁停金属通货的流通^③。

第四,元灭金,遂于中统八年(公元1267年)八月诏令要求专以中统钞标示物价,在灭南宋后,亦施行于旧南宋地区^④。錠、两、分、钱等银等重量单位作为中统钞等货币单位,遍及金宋旧地。蒙元行用等纸币一度以贯文等来标示中统钞的面额单位,事实上是为了便于交流中的核算,且明确了核算的比率关系,货币单位实质上还是银的重量单位。

至元二十年(1284~1294)蒙元对于江南的统治走上正轨,至元年间(1264~1294)末期,货币统一在江南故地告一段落^⑤。至此,蒙元货币统一的总进程功成。

(四)蒙元纸币的发展阶段

蒙元纸币大体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世祖之前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四朝时期。太祖末年(公元1227年)何实在博州印制会子,以丝为本^⑥。据《元史》卷二《太宗纪》,八年(公元1236年)正月:“诏印造交钞行之”。太宗十二年(公元1240年),刘肃在邢州行用楮币^⑦。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在京兆发行交钞^⑧。同年,设立交钞提举司,专管行钞事宜。蒙古行钞决定了其统一货币的纸币“基因”。第二阶段是世

① 蒙古体系亦被称为“重商主义者”,其中,西域商人使用白银放高利贷,被称为“斡脱”。参见日本学者爱宕松男著《斡脱钱及其背景——13世纪蒙古元朝银之动向》,以及 Blake(1937)。

② 据《元史》卷九《世祖本纪》,至元十四年四月丙戌条、卷一一《世祖本纪》,至元十七年正月丙辰条、六月壬辰条、卷一三《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二年二月壬戌条、八月戊辰条。

③ 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七《治道》中,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郑介夫的长篇奏摺中提到的命令禁止使用铜钱的圣旨一节中有如下记载:“虽畸零使用便于细民,然壅塞钞法,深妨国计,钦之。”(转引自[日]高桥弘臣著《宋金元货币研究——元朝货币政策之形成过程》)

④ 这在《元史·食货志·茶法》以及《元史·食货志·二盐法》中,都能发现茶、盐价格均以中统钞标示。

⑤ 蒙元在江南的货币统一政策也有不彻底之处,一些地区并不能行用纸币,尔被迫作出妥协而是用铜钱。这也引起有关要求解禁铜钱的议论,但并没有成功。究其原因,江南回收铜钱很不彻底,富有铜钱的江南自然不同于乏于铜钱的华北,华北的铜钱被挤出或直接南流入江南。另外,蒙元虽灭宋,但势力主要在长江流域,对于闽越和两广的控制力便有所弱化。由此,在江南出现了“撰钱”的现象,亦即铜钱排斥纸币。这可以说是中国货币史上铜钱的“绝响”,之后,铜币再也未能回归主币的通货地位。

⑥ 据《元史》卷一五十一《何实传》:“丁亥(公元1227年)……博(州)值兵火后,物货不通,实以丝数,印置会子,权行一方,民获贸迁之利。”又据《续文献通考》:“太祖末年,何实行元帅府事于博州,值兵火后,货物不通,实以丝数,印置会子,权行一方。”

⑦ 据《元史》卷一六十《刘肃传》:“庚子,世祖居潜邸,以肃为邢州安抚使,肃兴铁冶及行楮币,公私赖焉。”

⑧ 见《元史》卷四《世祖本纪》。

祖之中统钞时期。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世祖施行币制改革：七月印发“中统交钞”，又称“丝钞”；十月印发“中统元宝钞”。宝钞以金银为保证，以白银为主，可以称之为银块本位制。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又添印“鳌钞”，三年后即废。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统一江南通货：预备收兑江南纸币关子和会子，发行额剧增，由此不再有现银准备，且始禁铜钱；同时，中统钞钞板由木板改为铜板，合并交钞和宝钞。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全面收兑江南纸币，实行铜禁、钱禁。第三阶段是世祖至元钞时期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发行至元钞。至元钞称贯，中统钞称两。实际上，至元钞致力于收兑江南通货，设定为贯单位便于换算，确定了贯两换算比例，实际上依然是银重量单位。至元钞发行初期，拟完全收兑中统钞，实际上没有做到，中统钞与至元钞混用，中统钞依然发挥物价标示作用。第四阶段是武宗至大年间的币值改革时期。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九月实行币制改革，发行至大银钞。银钞每两合至元钞五贯，或白银一两，或黄金一钱。同时，铸行至大通宝和大元通宝铜钱，恢复历代古钱流通，限期收回中统钞。这便使蒙元的货币体系更加接近银本位，白银届时已经成为正式的价值尺度。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正月武宗薨，四月仁宗即废至大银钞和铜钱，恢复中统钞和至元钞。仁宗还恢复了境内民间的金银自由买卖。第五阶段是顺帝的至正钞时期。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实行币制改革发行至正钞和至正通宝铜钱。至正钞无发行准备，是纸币本位^①。

蒙元纸币虽历经上述五个发展阶段，但是纸币贬值每况愈下，备受诟病。事实上，在全球货币历史中，纸币发行往往伴随着恶性通胀，称为惨痛的货币历史记忆，这在18世纪以降各国的货币历史中更为触目惊心。总体来看，蒙元纸币体系统一了夏、金、宋等的货币，结束了唐末五代以降几个世纪的货币割据局面，开辟了货币历史的新格局，推进经济的整合于发展，是非常成功的纸币历史实践。

五、如何认识与评价蒙元的货币统一

蒙元的货币统一是中国货币史上第二次货币统一，它带来了根本性的制度变革，一则是通货专用纸币；二则从此牢固地确立了银作为价值尺度，亦即计价货币。这就使得南北经济重新融合，以白银为根本的货币经济在东亚得以确立。

(一) 史上“第二次货币统一”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货币统一确立了铜铸币作为货币经济发展的轴心力量。作为贱金属，铜作为通货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货币经济的长期、持续地发展与扩张。第一次的货币统一是铜铸币形制上的统一，自然延展为铜铸币的重量得以标准化。问题是，秦钱过重，统一了形制之后的铜铸币的标准重量如何确定呢？直到汉代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五铢钱的铸行，钱币的重量的摸索阶段结束了，标准重量问题才得到解决。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铸币权终于统一到国家的手中。三国时期，曹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正式颁令停止使用铜铸币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币。”^②这一时期的蜀汉也实行铜铸币的减重策略。东汉末年以降，货币经济出现了倒退。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铸行“开元通宝”^③，更替了隋代的五铢钱。这表明了，中国货币历史上以年号钱替

^① 参见千家驹、郭彦岗著《中国货币演变史》。

^② 参见《晋书·食货志》。

^③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累)。”二铢四累合一两的十分之一，即十枚开元通宝折合一两重。

代了纪重钱,这是中国度量衡体制的重大变化^①。这是第一次货币统一之后的重大货币变革,不仅恒定了主币的标准重量,而且,确定了成色标准^②,更为重要的是,衡制与铸币相同,这些都为铜铸币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唐宋经济的繁荣,使得铜铸币大行其道。中国货币史上铜币的巅峰时代出现了。

继秦始皇统一币制后,蒙元的货币统一,是中国货币历史上的第二次货币统一。举凡这一次货币统一的历史意义,主要有五:(1)历史性地将中华帝国的诸经济区域联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货币经济体系,结束了货币割据^③。(2)历史性地终结了铜铸币作为主要通货的地位,全面地推行了纸币。这进一步说明,相较西方贵金属货币体系而言,贱金属——铜铸币体系更能够有效地推进货币经济的发展^④,且更早地进入到信用纸币的历史阶段^⑤;(3)历史性地确立白银的计价货币地位,使白银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使中华帝国乃至更广泛的东亚地区普遍地以白银为主要通货,引发了巨大的白银国际需求;(4)历史性地消除了实物货币,使之从常态通货缩减为特例通货,从而使包括中华帝国在内的更广泛的东亚地区总体性地进入到货币经济时代;(5)对于东亚货币经济、亚洲乃至亚欧的货币融合作用巨大、意义深远。

(二)“纸币”对“纸币”的统一

宋元之间,纸币从局部性货币事实发展为趋势性的货币事实。纸币起源自铁币,以交子替代铁币而已;之后,铜币也有了相应的纸币——会子;金灭亡前发行了“天兴宝会银钞”,是货币史上最早的以银为本位的纸钞;南宋临近灭亡发行了银会子,金属货币普遍地“纸币化”。这就表明,纸币从局部事实演化为趋势性事实。如果说秦的货币统一是“铜币”对“铜币”的统一,那么,蒙元的货币统一则是“纸币”对“纸币”的统一,亦即顺应货币历史的发展趋势,使纸币作为趋势性的货币事实彻底地放大为普遍的货币事实。有元一朝,在财政收支中以货币方式进行的部分专用纸币,交易中也原则禁止使用铜钱、金、银等支付,这就使“纸币专用”成为蒙元统一货币的基本政策。

(三)银成为计价货币

蒙元货币统一的主要内容是纸币的统一,其核心在于,确立白银的(计价)货币地位。亦即,以银本位纸币统一铜本位纸币。事实上,金与宋在临近灭亡之际都曾发行了银本位的纸币,但是真正推行银本位纸币的是元。宋元之际,白银全面回归,作为贵金属不仅在地位上胜出黄金,而且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有元一朝,白银普遍作为货币窖藏,同时它也是纸币的发行保证。从

① 以往中国的度量衡体制中,长度是十进制的,重量则不同:每二十四铢为一两,每十六两为一斤,都不是十进制,实际上应用都很不方便。后世人们感到十钱为一两比二铢四累为一两更便于计算,于是约定俗成地出现了一个新的单位钱。(参见丘光名著《中国古代度量衡》)

② 开元钱还为日后世制定了铜质钱币的成色标准,即铜占 83.33%,白镴 14.56%,黑锡 2.11%。(参见千家驹、郭彦岗著《中国货币演变史》)

③ 两宋时期,南北经济分离的局面得以历史性地终结,蒙元开启了一个联结南北经济的货币经济体系。

④ 近代以来,关于贵金属更易于推行信用纸币是一种对全球货币史的误读。以贵金属为本位的纸币发行同样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以纸币发行为职志的银行体系在欧美均受到公众乃至政治体系的深刻怀疑。应当说,东西方货币历史上,纸币的早期行用都有其失败的历史,亦不乏恶性通胀的早期经历。没有理由认为,货币史上的贱金属较贵金属而言,更易于导致通货失败。相反,从历史看,贱金属货币经济体系不仅开风气之先,全面推行了纸币行用,而且恰恰是通过纸币行用而导引贵金属——白银——作为普遍的计价货币,引发了实银的巨大国际需求。

⑤ 元朝行用纸币,早于欧美 6 个世纪有余,美洲出现纸币是在 1692 年,法国在 1716 年开始流通纸币,英国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俄国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发行纸币。欧美各国迟至 18 世纪才正式发行纸币,大都受到通货膨胀的严重冲击,亦颇为坎坷。

一系列的元杂剧的表述以及朱世杰《算学启蒙》中载明的钱文与银计价来看，元朝民间的借贷、劳务报酬、物价，乃至日常交易等多用银^①。

正是两宋时期，货币的割据性和复杂性，促发了纸币的滥觞，加剧了物价的波动，使得贵金属白银作为计价货币的优势日益彰显出来。由于银数量有限，虽有日趋增强的货币需求，但是实银依然难以成为主要货币。于是，以白银为本位的纸币成为货币统一的根本性依靠，银成为计价货币。正是由于银成为计价货币，白银的货币需求推动了历史性的乃至全球性的白银供给的增长。

(四)中央财政与纸币行用的关系

蒙元货币统一使中央财政与纸币行用的关系问题更加凸显出来：一是只有强大的中央财政才能够实现货币统一并通行纸币；二是必须有效地约束中央财政过度发行纸币。

第一个问题，蒙元的中央财政在货币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纸币的最初发行是地方性质的，往往是地方军政当局主导之。这种情况本来是战时的特例，易言之，是在国防体系下的变通应对，但在两宋地方军政当局主导地区货币发行几乎成为常态。这从根本上否定了汉代所确立的中央对于铸币权的全国性垄断。这就说明，货币的割据性标志着中央财政权力受到人为地侵蚀，是为中央财权弱化的征兆。正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宋中央政府事实上放弃了统一货币的意愿，而是人为地制造货币的分裂。这也恰恰反映出两宋中央财政的羸弱，根本不能够承担其货币统一的重任。那么，金的货币发行实现了完全的纸币化，中央政权也体现出其强大的力量。问题是，金的货币经济并不够强大，且中央财政的国防或战时支出非常繁巨，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可以说，金也没有力量实现对南宋的统一，甚或在宋蒙对其联合进攻下，而亡了国。

在南宋、金、蒙古三种割据势力的斗争中，只有蒙古能够将大范围的经济资源转化为有效而强大的可持续的军事资源。蒙元的军事对峙持续了几十年。蒙古事实上是调动了更为广泛地域的经济力量并“有效地”投入到对宋战争，才取得了伐宋战争的胜利。对南宋的政府而言体现了蒙元的中央财政能力，不仅能够有效地管理战争，使之成为一大产业^②，更能将中央财政能力用于纸币行用与货币统一上。

与金或南宋截然不同，蒙古势力的中央财政汲取能力或动员能力是十分强大的，它崛起于亚洲内陆，迅速征服了中亚西亚，并深入到欧洲腹地。蒙古受金朝影响而行用纸钞，但其纸币本位是白银。这是同其与中西亚的日益紧密的联系分不开的。

蒙元中央财政打得赢伐宋战争，在收兑旧南宋纸币的问题上，却并非一帆风顺。这依然需要强大的中央财力。蒙元中央财政有能力完成货币统一最后最为艰巨的阶段，核心是依靠中央财政的收入，其中中央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五是盐税。可以说，进入江南后，蒙元中央财政能力得到加强而非弱化，这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盐茶等大宗商品等政府管制，及建立在其上的“券”“引”制度。管制大宗商品直接带来了政府税收，且有关交易通过相应的“券”“引”买卖而实现，对于实现统一后的蒙元中央财政收入与支出的货币化打开了方便之门。这就使得中央政府能够有效地采取全面收兑旧南宋纸币的政策。

^① 关于元代货币单位的有关研究文献，主要有以下几种：(1)[日]前田原典著《元代货币单位》。前田的研究表明，元代白银已经具有了作为价值尺度的功能，纸币的面值再以贯、文等铜钱单位表示的同时，实际的货币单位使用锭、两、钱、分等银等重量单位，在整个蒙古体系中，中国的重量单位与国际单位之间的换算非常容易，直如今日。(2)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3)[日]足立启二著《专制国家与财政、货币》。(3) Von Glahn(1997)。

^② 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所著《忽必烈的挑战》一书中，对于此有明确的阐释。

蒙元朝廷还大量启用色目人,这些来自中西亚的穆斯林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以及国际贸易与商业的经验,特别是当色目人阿合马^①掌控了中央财政之后,蒙元的财政汲取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这也遭到时人及后人的普遍诟病,直斥为盘剥劫掠。毫无疑问的是,财政官僚组织的穆斯林化强化了蒙元中央财政能力,进而极大地支持了蒙元纸币体系。

第二个问题:如何有效地约束中央财政,稳定纸币发行。

大体而言,元朝制定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纸币管理制度,发钞是比较严密的,并以大量的金银作为发行准备,纸币发行权归属中央,且控制发行总量。然而,这些优势在蒙元中后期渐渐削弱了,政府财用不足日益显现,军费高昂加之其他政府支出使财政陷入入不敷出^②,蒙元中枢一再增发新钞,以应时艰,别无他法。据《新唐书》索记载,“……行之未久,物价腾贵。又值军兴,粮储赏犒,每日印造不计其数。京师钞十定易斗杰不可得。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易。公私之钞,积村不行,人视之如废楮焉”^③。

中央财政与货币印行“一体化”而普遍带来的问题便是不可避免地深深陷入到过度发行的泥淖之中,从而为由此引发的恶性通胀而吞噬,金元两朝盖莫如此。这就表明,铸币时代结束后,中央财政发行货币,必须具备非常明确而有约束力的纸币回收机制。若非如此,不足以平抑物价,确保纸币的购买力,势必因滥发而引发通胀。

这个道理在两宋是清楚而明确的,因此其纸币分界发行与折价回收是基本纸钞行用的基本保障。金朝模仿宋发行纸币,但这一基本保障渐趋废弛。金朝在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废除了7年鳌革的制度,60年后,南宋会子也实现了无限期流通,是为纸币发行史上的划时代的重大事件。然而,这等同于废除了纸币回收制度,纸币购买力便完全取决于发行总量了。

全球货币史上,各国的货币发行或多或少都曾于此铸成大错。现代纸币发行基础有三:贵金属、外汇,以及国债。应当说,现而今各国纸币行用大体上是通过发行公共债务来解决的。运用发行公共债务来约束中央财政预算,进而避免过度发行纸币。这样一条道路或模式,只是发生在近代西方,且与议会政治之革新相辅陈而日益彰显。

纸币行用的失败往往直接意味着中央财政的崩溃与瓦解,中国货币史上此类例证不胜枚举。究其原因,不外于专制集权下的中央财政无法实现有效的自我约束而已。由此来看,蒙元的货币统一虽得助于强大的中央财政,但是它并没有就此带来一个具有近代民主化的自我约束的财政体制或观念。就具体情形而论,越是强大的中央财政越是具有强烈的扩张支出的动机与能力,也最终不可避免地反噬掉初行健康平稳的纸币体系。

自宋元以降,中国货币思想史上关于纸币行用的争议颇大,可谓莫衷一是,实践中亦不乏反复^④。由此可见,蒙元货币统一并没有解决中央财政与稳定纸币发行的关系。应当说,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意味着需要议会民主约束下的中央财政体制的建立,更意味着经济社会中普遍确立起债务约束的机制,特别是公共债务体系,从而使财政支出从根本上与其债务收入能力相匹配,从而摆脱其货币超发的历史局限性。

① 阿合马(阿拉伯语:ناتانی احمد, Ahmad Fanakati, ?—1282年),回回人,元世祖忽必烈时的近臣之一,出生于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官至宰相。

② 据元朝王恽所著《秋涧集》卷九十《便民三十五事·论钞法》记载,“其至元十三年已后,据各处平准行用库倒到金银并原发下钞本,课银节次尽行起讫,是自废相权大法”。仁宗即位后,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

③ 参见柯劭忞著《新元史》卷七四《食货志七·钞法》。

④ 元明清三朝关于纸币行用先后爆发了几次大的论争,结果不一。只是到了清朝,停止行用纸币,前后凡一百九十余年。

六、蒙元的货币统一与世界经济的诞生

蒙元的货币统一促使东亚从铜经济转变为白银经济,亚洲乃至亚欧的货币融合发生了。由此,开启了两个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进程:第一,亚欧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以及白银的全球性需求的发生;第二,正是白银的全球性需求几个世纪持续地搅动了全球经济活动,使之普遍联系而成为世界经济。

(一)世界经济发轫于亚欧

蒙古实力崛起于亚洲内陆蒙古高原,其迅即地向整个亚欧大陆扩张,主要方向有三:一是中亚西亚,造就了伊儿汗国,掌握了横跨亚欧大陆的力量轴心;二是东亚大陆,并吞了金与南宋等,建立了元朝,统合了人口最为众多、财富至为繁盛、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最高的汉字文化区域;三是缘西越过乌拉尔山脉,达至东中欧,确立了金帐汗国。蒙古势力在此三个方向的成就各有不同,共同成就所谓的蒙古体系。总体来说,蒙古势力对于东亚的统一与整合具有根本性的世界影响,历史影响亦更为深远而巨大。

蒙元的军政统一及其大规模的经济举措结束了五代以降南北经济分裂的局面,特别是,货币的统一结束了以铜为本位货币经济极盛而衰的乱局,通过银计价纸币的行用,将东亚大陆的货币经济从铜经济转轨为白银经济。这一货币经济的历史性大转轨有力地推进东亚与中西亚的货币经济融通,密切了包括印度等南亚地区在内的亚洲内部的普遍经济联系。简言之,蒙元货币统一终结了东亚经济的铜币时代,继之以纸币形态的白银经济,从而使最为发达与富庶的东亚经济,与久已存在的中西亚与欧洲的白银经济,联结成为一个亚欧大陆整体性的白银经济体系。

日本学者彬山正明指出,蒙古造成了伊斯兰“全球化”。在其名著《颠覆世界历史的蒙古》一书中,指出“蒙古与伊斯兰穆斯林两者以军事和通商的结合为主轴,在一种堪称“共生”的关系下,自忽必烈起将当时欧亚最富庶的中国全境纳入版图,成为一个拥有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甚至涵盖海洋世界的“大元汗国”,这个全所未有、用中国式称法号为“元朝”的新型世界国家,于是获得了规模更大的发展”^①。的确,在蒙古势力下,忽必烈和他提拔的穆斯林经济官僚主导着一切经济事务。他们新造联结了陆路于水路的世界帝都“大都”,以作为巨大的物资集散基地,并以此为中心整顿了陆海交通运输网。蒙古体系并非是一个内陆的、野蛮的、封闭的体系,相反它是一个联通海洋的、发达的、开放的重商主义和自由经济体系^②。蒙元帝国事实上是由三种力量构成的:蒙古游牧军事力量、汉人的行政官僚、穆斯林经济官僚。在中央机构的设立上,忽必烈曾创设了“制国用使司”,以强化中央财政。除此以外,还确立了所谓的斡脱制度^③,以白银为资金的商业和信贷组织,促进了亚欧大陆体系的物流通商,也促进产业化^④。这种商业组织的主体是穆斯林商人,其无所不在的商业

^① 参见彬山正明[日]著《颠覆世界史的蒙古》。

^② 彬山正明指出,“在忽必烈国家内部,尤其应该注目的特点,是它一方面原以游牧军事力作为基盘的军事政权,但最终却不依靠军事力的支配,而是将国家经营的主轴放在经济的掌握上。与此相关者,就是发挥了中华帝国特长的行政机构,它是联系这个军事与经济的中介角色。”(参见彬山正明著《忽必烈的挑战》)

^③ 斡脱,蒙古语 ortog(突厥语 ortaq,意为合伙)的音译,指蒙古统治者经营商业和高利贷的西域商人。他们所放钱债利息很高,息转为本,又复生息,时称“羊羔息”。元朝时政府为皇室、诸王的斡脱单立户籍,并设立斡脱所、斡脱总管府等机构掌管有关事务,使斡脱的特权商业活动有了制度保障,这就是斡脱制度。

^④ 与无所不在的蒙古游牧军事力量相对应的是,无所不在的穆斯林商人,特别是伊朗的穆斯林商人,对于蒙古体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他们往往以斡鲁脱克为组织形态。

与信贷活动(Rossabi, 1981)与东亚的白银计价的经济体系相结合奠定了亚欧大陆经济。

这一亚欧经济不仅在内陆而且在海路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亚欧经济日益强劲有力的内在联系,极大地提升了欧亚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进程。由此,不仅西亚、中亚在欧洲与东亚、南亚所谓的东西方贸易中发挥日益重要的桥梁作用,而且印度洋直至西太平洋的大洋贸易也发展起来且成为亚欧贸易的主轴。世界经济的胚胎正是在此巨大的“世界岛”体系内孕育萌发,换言之,亚欧大陆及其沿海的经济联系,经受蒙古势力的冲击与锻造,形成了区域经济联系或国际经济联系的固有范畴,而具备了整体性的世界经济的雏形。

日本学者岡田英弘明确指出,蒙古帝国征服了西亚、欧洲、中国,创造了各国国民,明清、俄罗斯、奥斯曼帝国等事实上是蒙古等继承国。他在其名著《世界史的诞生》中,明确地指出,蒙古帝国让世界历史变得可能^①。在蒙古势力衰败甚或大规模退却后,东亚大陆由它的继承者明清持续维系着庞大的专制帝国^②,西亚穆斯林势力强势,欧洲依然处于亚欧体系的远端,内部纷争持续,相对弱势。

亚欧经济体系的地缘关系表明,欧洲处于这一体系的远端,其与亚洲的海路过于遥远甚或远未开发,陆路受制于伊斯兰世界的左右,并且欧洲相对亚洲而言尚处于历史的低点,是亚欧经济体系中贫穷乃至落后的“远端”。历史地看,是为亚欧经济体系不平衡最为突出的表现,这就决定了欧洲急于改变自身在亚欧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开辟独立的航路直达南亚甚至东亚。虽然如此,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经济自成一格,有能力与意愿绕开与其冲突甚巨的伊斯兰世界的阻隔,而寻求独立地开辟出通往亚洲的航路,建立与南亚印度甚至东亚中国直接的贸易或经济联系。

由是,欧洲开启的大航海时代,达伽马开辟了通往印度的新航路,使欧洲(特别是西欧)直接建立其与南亚乃至东亚的海路经济联系,也使非洲整体性嵌入到亚欧经济版图中;大航海时代还迎来了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使美洲以及非洲各海岸加入到既有的亚欧经济体系中来。公元1500年后的欧洲改变了自身在亚欧经济体系的弱势地位,放大了亚欧经济体系为世界性的经济体系^③。这个放大事实上是两种力量搅动起来的:一是所谓的“哥伦布交流”带来的全球物种的大交换,改变了全球种植业的基本面貌^④;二是美洲白银搅动起全球经济,使世界货币与世界经济得以在全球范围确立起来。

当西欧所策动的地理扩张遍及美非之后,世界经济依然以亚洲为轴心:美洲作物的引种使亚洲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幅超出欧洲,且白银只是在亚洲的货币需求的强力作用下成为世界货币。

(二)世界货币产生于白银

蒙元货币统一后,白银本位的纸币的普遍使用,使得印度、朝鲜、日本等国也曾效仿元朝发行

① 参见岡田英弘著《世界史的诞生》。

② 明朝大体延续了元的体制,保留了行省制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依然在这一架构下运转,继承了蒙元军户与民户的模式,军政格局的继承性大于变革。清承明制更为突出,更强化了八旗体制。明清两朝应对大量的内外挑战,政治趋于专制,社会文化趋于保守。社会经济则在蒙元统一的基础上持续保持着在亚欧体系中的国际优势,直至18世纪中叶欧洲开始在全球发力而逐步确立其对于全球事务的支配性地位后,中华帝国才日趋保守与封闭,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渐趋下降乃至衰败。

③ 必须指出的是,公元1500年欧洲的地理发现或扩张,孕育出所谓的欧洲中心论,抑或所谓的西方中心论。英国学者杰克·古迪在其名著《偷窃历史》中说到,西方人创造了历史学科,并顺带将自身放到中心位置。(参见杰克·古迪[英]著《偷窃历史》)历史地看,大航海时代欧洲的地理扩张的动力、目标与指向是亚洲,是亚欧经济体系的扩张的必然组成部分。不理解甚或根本无视蒙古体系,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落入中心论的陷阱。

④ 此方面主要可参考文献:Crosby, 2003; Worster, 1994; Diamond, 1999。

过纸币,经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流传到欧洲的“大汗纸币”^①,更令欧洲人惊叹称奇。蒙元货币统一使亚欧货币融通更加巩固在白银基础上,人口最为众多、经济最为繁盛的东亚纳入到白银经济体系,直接扩张了白银的世界性需求。这一需求最初是在亚欧体系(包括非洲北部)内部解决,白银供给的总量因此不断增加,并大量地流向东方。明英宗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朝廷令南方的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各布政司范围内不通舟楫地方的米麦用白银折纳。同时,对民间也放松了用银禁令,由此官府与百姓都能使用实银^②。籍此,蒙元货币统一之后数十年,白银既从计价货币转变为实际通货,更加扩张了白银需求^③。

1545年和1548年在秘鲁(今玻利维亚)到波托西和墨西哥到萨卡特卡斯先后发现银矿,由此美洲白银开始涌入非洲-欧亚范围的金银市场^④。如果加上日本和其他地方生产的白银,全球白银产量的一半最终抵达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用了64页的篇幅来论述“过去4个世纪的银价变动”,书中与此相关的论述遍及各个章节,他指出,“秘鲁的白银价格……肯定不仅对欧洲银矿产出对白银价格有影响,而且对中国银矿产出的白银价格有某种影响”。因此,“没有人怀疑有一个白银的世界市场。问题在于如何描述其模式”(Flynn,1991)。

全球白银贸易本质上是矿产品贸易,亦即白银被开采、运输和交易,独立于任何其他贸易。大量的白银流入亚洲,取决于亚洲对于白银本身的需求,而这个需求则是货币意义上的需求。这是蒙元货币统一,将东亚的铜经济转变为白银经济的历史结果。相对来说,欧洲最终留下的白银相当部分用于制造奢侈品,包括大量的银制餐具、烛台,等等。欧洲人使用白银来平衡其与亚洲贸易等结构性逆差,而亚洲获取来自世界各地的白银,并不是用来奢侈消费,而是直接将白银充作实银通货。明清两朝,奉行的实银通货,是不定标的所谓“称量货币”,其本质是“自由银”货币体制^⑥。自由银货币体制产生了极其巨大的白银需求,而正是白银搅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可以说,如果没有东亚的白银货币经济需求拉动,全球白银产业的勃兴只是带来矿业的繁荣,白银将更多地作为奢侈品而进入西方经济体系,而非货币流入亚洲。

古罗马著名诗人普布流斯·西鲁斯曾说:“金钱自己就可以让世界转动。”蒙元货币统一是银经

① 《马可波罗行纪》[法]。

② 参见《明史·食货志五》:“英宗即位,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驰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惟折官俸用钞,钞壅不行”。

③ 事实上,蒙元货币统一使用白银计价纸币,其考量之一,便是实银的短缺,不足以普遍应用于整个东亚。明承元制,也采取了实银禁令。但是,大量的实银还是不断渗透到明,其从计价货币到实银流通渐趋成熟。

④ 参见贡德·弗兰克[德]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⑤ 据经济史权威估计,从1493~1800年世界白银产量到85%和黄金产量到70%来自拉丁美洲。美洲白银生产在16世纪约为17000吨,到17世纪约为42000吨。其中有31000吨运抵欧洲。欧洲再运出约40%计12000吨运往亚洲,其中4000至5000吨是直接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运送的。另外6000吨运往波罗的海地区和黎凡特地区,除留在当地的部分外,其余再运至亚洲。(参见陈燕谷《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

⑥ 中国的称量货币体系的本质是自由货币体系,这种体系极大地刺激了其货币需求。这种自由的货币体系,使得朝廷中枢无须耗费巨量的成本来管制白银货币。这事实上也掩盖了白银的货币需求与白银的原料需求之间的差异。从世界经济的视角来看,白银的货币化首先是在东亚开始并发展壮大的。自由白银货币体系能够有效地使白银渗透到社会经济地各个层面,这对于当时的货币制造技术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完全由朝廷官方来垄断白银,将非常可能重蹈铜铸币的窠臼。即便实行了自由白银货币体系,中国还是出现过“银荒”。明清两朝直至民国22年(公元1933年)推行“废两改元”,及民国23年(公元1934年)实现白银去货币化前,都没有确立起全面的白银货币管制的体系,奉行了500年自由银通货体制,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有关议题可以参阅朱嘉明著《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上卷)》)

济替代铜经济,在东亚形成了历史性的白银需求的势能,美洲白银使这一势能转化为搅动全球经济的动能。只有巨大的白银货币性需求,才能够全面地拉动全球经济。事实上,全球经济货币化是在白银基础上完成的,而不是在黄金的基础上实现的^①。

白银是国际货币,但是美洲白银更像大宗国际商品供应源头,大量产出的白银用来扩张欧洲对亚洲的国际贸易。欧洲需求亚洲的商品,而亚洲需求欧洲带来的大宗矿产品——美洲的白银,籍此,世界贸易才全面发生了。需要关注的是,美洲内部的贸易则基本上采取易货贸易的形态^②,殖民者在墨西哥和秘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控制白银输往亚洲与欧洲,这致使美洲作为白银及铜的世界性的供给方,却始终陷于铸币短缺的状况^③。1565年,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使之沦为其殖民地,太平洋成为“西班牙湖”,于是美洲白银便自东而来。18世纪,全球白银铸币的两个策源地形成了,一是美洲的墨西哥银圆^④,一是欧洲的特蕾莎银圆^⑤,分别向亚欧大陆体系的东亚和西亚北非等地提供充足的银币。围绕着亚欧世界经济的白银货币体系形成了。

18世纪中叶是世界经济从亚欧大陆扩张到全球的重要时期,世界经济亦建诸于白银货币之上。蒙元的继承者清朝依然是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白银货币最多的经济体,但同时,西欧已拥有对全球事务的支配能力。18世纪的世界经济已经伸展到是全球各地,它是一个货币经济,是一个白银货币主导下的世界经济。

(三)世界经济的“白银化”与“去白银化”

人类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联系亘古有之,大范围地理空间内的“长距离贸易”的经济历史也颇为久远。但是,这些并不是所谓的“世界经济”,要发展成为世界经济需要跨越两个历史阶梯:一是要走出实物经济,孕育出货币经济;二是走出区域货币经济,使货币经济普遍联系成为一个整体。

由于金属矿藏资源的地理分布极为不平衡,有针对性的金属冶炼技术成熟进度亦颇为缓慢,这些都决定了广大地理范围内实现金属货币经济的一体化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国实现了规模庞大的铜币经济,而当铜币经济不能进一步推进东亚的货币经济扩张而陷入割裂、保守,在通货纷争与动荡后,蒙元实现了货币统一于白银计价的纸币。际此,白银从国际货币提升为世界货币,亚欧世界经济建诸于白银货币的基础之上。正是基于此,欧洲地理扩张所取得的美洲白银才使其有能力弥补对亚洲的长期巨额贸易逆差,且使美洲和南部非洲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来。

世界经济的白银化肇始于蒙元货币统一的13世纪,14世纪白银计价货币体系转变为实银货币;15、16世纪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渐趋边缘化的欧洲最终凭借新航路和美洲白银,调整并改善了

① 举例来说,16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出口中货物只占6%,贵金属则占94%。从1660~1720年的60年间,贵金属占东印度公司对亚洲出口总值的87%。虑及白银在亚洲,特别是明清两朝,始终拥有比欧洲更高的黄金兑换价,就不难发现白银流向亚洲带有无法抗拒的“必然性”。

② 参见布罗代尔[法]著《十五到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

③ 即便在北美殖民地,宗主国英国也限制铸币流入,成为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龃龉乃至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④ 墨西哥银圆被清人称为“双柱”,有1732年开铸的“双球”和1772年开铸的“人头像”两种。1821年墨西哥独立,1825年停铸“双柱”,改铸“鹰洋”。

⑤ 1741年,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莎开始在奥地利、匈牙利、波西米亚等地发行一种新型货币——塔勒币(thaler)。这三地形成了当时欧洲最大的政治经济群落,塔勒币逐渐成为其通行的货币。由于黎凡特商人的广泛使用,塔勒币成了人们信赖的白银来源,并逐渐成为唯一被阿拉伯世界接受的流通货币,也成为阿曼国的官方货币。后来,塔勒币的流通又扩散到北非海岸、清及东亚地区。它也是美利坚建国后最早使用到的币种之一,美国官方货币dollar名称便源于thaler。(参见菲利普·梅里曼[英]著《银子:一部生活史》)哈布斯堡王室覆亡后,直至20世纪前期,塔勒币依然在非洲西亚等地流通。

与世界经济中心——亚洲的关系;17、18世纪世界经济重心缓慢向西方倾斜;18世纪中叶起,欧洲,特别是西欧,开始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支配性的影响力。

19世纪欧洲开始奉行金本位,世界经济出现了黄金与白银的货币大分流。自此,世界经济快速地实现了去白银化,白银商品化使银价趋于浮动。作为全球最大的白银经济体——满清(中国),不仅丧失了全球贸易中的优势地位,接连发生巨额国际赔款乃至借贷,且遭到国际银价波动的一系列严重冲击^①,货币情势复杂动荡。晚清至民国,货币纷杂与衰败的局面达至中国货币史上的谷底。民国23年(公元1934年)推行法币改革,彻底退出运行了5个多世纪的白银经济。际此,中国面临着继蒙元货币统一所谓“第二次货币统一”以降的“第三次货币统一”,以重新确立起货币基础。

参考文献

- 爱宕松男(1973):《斡脱钱及其背景——13世纪蒙古元朝银之动向》,《东洋史研究》,第32期。
- 班固(2000):《汉书》,浙江古籍出版社。
- 彬山正明(2014):《颠覆世界史的蒙古》,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彬山正明(2014):《忽必烈的挑战》(中译本),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波罗,马可(2004):《马可波罗行纪》,中华书局。
- 布罗代尔(1992):《十五到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一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陈世松、匡裕彻、朱清泽、李鹏贵(2010):《宋元战争史》(第一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陈燕谷(2000):《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读书》,第2期。
- 程民生(2004):《北方经济史》(第一版),人民出版社。
- 弗兰克,贡德(2001):《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二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 傅海波、崔德瑞(1998):《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一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冈田英弘(2013):《世界史的诞生》(汉译本),广场出版/远足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 高桥弘臣(2010):《宋金元货币研究——元朝货币政策之形成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
- 格鲁塞,勒内(1998):《草原帝国》(第一版),商务印书馆。
- 格鲁塞,雷纳(1989):《蒙古帝国史》(第一版),商务印书馆。
- 古迪,杰克(2009):《偷窃历史》,浙江大学出版社。
- 黑田明申(2007):《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第一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洪迈(2013):《泉志》(第一版),中华书局。
- 黄淮、杨士奇(1989):《历代名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
- 黄遵宪(2005):《日本国志(上册)》(第一版),天津人民出版社。
- 加藤繁(2006):《唐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第一版),中华书局。
- 加藤繁(2012):《中国经济史考证》(上、下)(第一版),中华书局。
- 柯劭忞(1989):《新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 科恩,本杰明(2004):《货币地理学》(第一版),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 李林甫(1992):《唐六典》,中华书局。
- 李心传(2000):《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
- 李跃(2008):《楮币史说》(第一版),浙江大学出版社。
- 林满红(2011):《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
- 刘昉等(1975):《唐书》,中华书局。
- 梅里曼,菲利普(2016):《银子:一部生活史》(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 牛达生(2013):《西夏钱币研究》(第一版),黄河出版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
- 欧阳修、宋祁(1975):《新唐书》,中华书局。
- 彭信威(2007):《中国货币史》(第一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千家驹、郭彦岗(2014):《中国货币演变史》(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前田原典(1944):《元代货币单位》,《社会经济史学》,第14期。

^① 参见林满红著《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

- 前田直典(1944):《元代钞之发行制度及其流通状况》,《北亚细亚学报》,第3期。
- 丘光明(2011):《中国古代度量衡》,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全汉昇(2011):《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第一、二卷)(第一版),中华书局。
- 沈长云(1999):《汉代史籍中的“亿万”、“巨万”究竟指多少》,《文史》,第3辑。
- 司马光(2009):《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 宋杰(1999):《中国货币发展史》(第一版),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 宋史(2003):《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 苏天爵(1996):《元朝名臣事略》,中华书局。
- 脱脱(1974):《辽史》,中华书局。
- 脱脱等(1975):《金史》,中华书局。
- 王钦若等(2003):《册府元龟》,中华书局。
- 汪圣铎(1998):《中国钱币史话》(第一版),中华书局。
- 汪圣铎(2003):《两宋货币史(上下册)》(第一版),社科文献出版社。
- 王恽(1998):《秋涧集》,江苏古籍出版社。
- 吴澄:《吴文正公集》
- 薛居正(1976):《旧五代史》,中华书局。
- 亚当斯密,亚当(2005):《国富论》,华夏出版社。
- 姚燧(2011):《牧庵集》第一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叶世昌、李宝金、钟祥财(2003):《中国货币理论史》(第一版),厦门大学出版社。
- 张廷玉等(1974):《明史》,中华书局。
- 章如愚(1992):《群书考索》,书目文献出版社。
- 郑学檬(2003):《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第一版,岳麓书社。
- 周良霄、顾菊英(2003):《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 朱嘉明(2012):《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上卷)》,台湾远流出版社。
- 足立启二(1950):《专制国家与财政、货币》,《中国专制国家与社会统合》,文理阁。
- Blake, R. (1937): "The Circulation of Silver in the Moslem East down to the Mongol Epoch",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 291-328.
- Crosby, A. (2003):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CT: Praeger.
- Crosby, A. (1986):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amond, J. (1999):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Y: W. W. Norton.
- Eagleton, C. and J. Williams (2007): *Money A History*, The British Museum.
- Flynn, D. (1991): "Comparing the Tokugawa Shogunate with Hapsburg Spain: Two Silver-based Empires in a Global Setting", Edited by Tracy, J.,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rchant Empi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nn, C. (2011): *Uncovering the New World Columbus Created*, NY: Alfred A. Knopf.
- Rossabi, M. (1981): "The Muslims in the Early Yuan Dynasty", Edited by Langlois, J., 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Von Glahn, R. (1997):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SMC Publishing.
- Worster, D. (1994): *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赵一新 马辰)